

论郑观应对 19 世纪德国的认知

覃亢节(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摘 要〕 中德关系史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随着近年来学界对“观念史”研究的重视,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人的德国观”成为中德关系史研究领域中的新思路。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早期维新知识分子,郑观应的德国观颇有研究意义。19 世纪 70 年代,郑氏对普法战争的认识较为浅显;80~90 年代,随着其思想体系的成熟,郑氏对德国的认知达到了较高水准,他全面介绍了德国的方方面面并呼吁中国学习德国;而到了 20 世纪初,虽然郑氏的德国观仍有可取之处,但他对德国君主立宪政体一如既往的热衷却显得与革命的潮流格格不入。研究郑观应的德国观,可以深化对中德关系史的研究,为当今政府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提供借鉴。

〔关键词〕 中德关系;观念史;郑观应;德国观

〔中图分类号〕 K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267 (2015) 12—0197—08

DOI:10.14129/j.cnki.forwardposition.2015.12.046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德关系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关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近年来,随着西方新文化史观的传播与普及,在中国史学界,形成了一股研究“观念史”的热潮。所谓“观念史”,可纳入“思想史”研究的范畴,它涵盖了精英知识分子、一般知识分子或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通俗地讲,就是对人的思想、意识与观念的研究,即以“意识”层面作为研究主体。基于这种全新的研究思路,学界对中德关系史的研究也找到了新的视角,学界开始打破政治史、外交史的束缚,转而以思想史的角度切入,即研究“中国人的德国观”。

胡凯先生的大作《中德风云际会》^①堪称践行这种研究思路的力作,该文较为全面地阐述了 19 世纪的中国人对德国的认知。作者认为中国官方对德国形象的认知相对于一般民众的对德认知更具有代表性,故而选择将中国官方对德国在华形象的认知作为研究的重点。^②笔者以为,这样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有一些未当权的知识分子,他们有文化,有先进的思想并且为国家的复兴而鞠躬尽瘁,这些人有着什么样的德国观呢?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早期维新知识分子,他一直关注着德国,并全面介绍了德国政治、军事

及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内容。学界对郑观应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颇多,但系统梳理郑观应德国观的文章,查阅知网,仅有郑宗玉的《论郑观应的德国观》^③一篇。郑先生从政治、军事及教育三方面论及郑观应的德国观,笔者以为,在此基础上,仍有提升空间。因为郑观应的德国观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不同时段,其德国观的内容及时代意义均不相同,如果以时间为轴梳理郑观应对德国的认知,或能得出新的结论。在胡凯先生的大作中,也并未涉及郑观应的德国观。基于这样的情况,笔者试图对郑观应的德国观做一番梳理,冀有拾遗补阙之效。

一、郑观应眼中的普法战争

普法战争是欧洲历史上的大事,从严格意义上说,正是基于这次战争,才有了统一的“德国”。对于这次战争,少数先进的中国人给予了及时而全面的关注,其中最为典型者便是与郑观应同为早期维新知识分子的王韬。1870 年,王韬访欧归来,身在香港的他,对普法战争给予了极大关注。王韬“午夜一灯,迅笔暝写”,初在香港《华字日报》上连载,后又在此基础上汇集补充成 14 卷本的《普法战纪》。^④然而与王韬迥异,在普

〔作者简介〕覃亢节(1989—),湖北宜昌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4 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思想史。

法战争爆发之后的近十年中,郑观应对普法战争的认识非常浅薄,或者说,他对普法战争的关注度很低。

郑观应的《易言》出版于1880年,该书集中反映了郑氏19世纪80年代之前的思想。在《易言》中郑氏认为:“尝闻德法构兵时,德所以胜法者,非德兵果精于法兵,亦籍电信与火车之行军迅速耳。当两国未战之先,德提督向法使言曰:‘如果欲战,我国可于十四日中,在边境集军十万,良械具备’。后果践其言,大获全胜。”^⑤“昔年普法构兵,普人于行军之处俱设电线,而法人所设之电线亦为普人所毁。是以法败而普胜也。”^⑥从这里可以看出,郑氏对普法战争的认识停留在一个较为浅显的层次。第一,把火车电报看作是比德兵之精良更重要的因素,有失客观。笔者不否认火车和电报在普法战争中的作用,但如果将其作用看得比军事的作用还要高,则是不合理的,众所周知,普鲁士是一个十分注重军事的邦国,而在民族主义的感召下,普国之人踊跃参军,故而德兵士气高涨,十分精良,这是获胜的决定性因素。第二,如上述史料中所言,德国可在十四天内集军十万,郑氏把原因归之于火车,这固然是一大因素,但若没有民族主义精神的感召,若士兵本身不积极,何以能有十万精兵,又何以能如此迅速地集结呢?第三,这些文字出自郑氏论火车、电报的文章中,之所以提及普法战争,是为了衬托火车与电报这两大主体。而真正讨论普法战争的文章,我们从《易言》中未曾见到。因此,在普法战争爆发后的近十年间,郑观应未曾去关注这一重大事件,而仅仅是在论述发展实业的重要性之余,偶然提到过这次战争。

与郑观应相反,王韬对普法战争给予了高度关注,他的《普法战纪》一书永载史册,关于王韬对普法战争的认知,胡凯先生在其大作中已有详细论述,故无需赘言。笔者要论述的是,同为早期维新知识分子,同样思想开放的王韬与郑观应二人对普法战争的认识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呢?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客观条件所限,20世纪70年代的王韬身在香港,有了解普法战争进展的客观条件,《普法战纪》是王韬在张芝轩、陈韞廷等人的帮助下,根据英国邮传电报中对普法战争的报导,随见随译而写成的。^⑦而郑观应身在大陆,没有了解普法战争的客观条件,郑观应所接触的外国人多在商界,这些人不可能去为郑观应介绍普法战争的情况,而当时中国内地的各种报刊,除了《申报》大量转载王韬的文章外,其他报刊介绍普法战争的非常少,目前笔者找到的,仅有《瀛寰琐记》第一卷有一则名为《戎法普兵

将撤日期》的报导涉及普法战争,也就是说,郑观应想要了解普法战争,其消息来源的确是不如王韬便利。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主要原因,因为毕竟王韬在香港《华字日报》上登载的普法战争的相关信息已经通过《申报》传到了上海,当时身在上海的郑观应,为何没有对《申报》上的相关消息予以关注呢?这恐怕就不是客观原因所能解释的了。其实,二人之所以对普法战争认识不同,乃是基于深刻的主观原因,如果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去理解,便不足为奇了。正是由于二人生活阅历不同,导致在20世纪70年代,即普法战争爆发之后的近十年间,二人的思想成熟度及关注点不同,故而对于普法战争的关注意度及认识程度也就不同。

20世纪70年代的王韬,已然是一位比较成熟的维新知识分子,他眼界开阔,举凡世界大事,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皆在其关注范围内。出生于1828年的王韬,其思想由相对保守到开化,从旧式文人转变成维新知识分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佣书墨海书馆的经历,使他对西方格致之学有了一定了解。第二个阶段是遁迹香港的经历。正是在这片英国的殖民地中,王韬深切感到了中国的落后以及学习西方资本主义之迫切性。第三个阶段是王韬的泰西之游。经过这次游历,王韬的改良主义思想基本形成了,恰如忻平先生所言:“如果说‘未经沧海’的王韬不过只是一个初具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萌芽的‘洋务秀才’的话,那么‘沧海归来’的王韬已变成了忧国忧时的魏默深,改良主义思想已渐见形成了。”^⑧综上所述,20世纪70年代的王韬,其思想已经相当成熟了,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重大事件无不在其关注范围之内,此时的王韬,能够及时关注并对普法战争这一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做出准确的评价分析,是在情理之中的。而初出茅庐的郑观应,并未形成成熟的维新思想体系,而仅仅是以实业作为考量问题的准绳,因此,对于一场与实业无甚关联的普法战争,没有能够引起他及时而高度的关注,就不足为奇了。1842年,郑观应出身于被称之为“买办故乡”的广东省香山县,香山居民同外国资本主义打交道者较多,郑观应的家族中就有不少人充当买办。郑观应在科举考试中名落孙山,而学贾却是现成的出路,因此,从少年时代开始,郑观应便与经商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终其一生,郑观应或充当买办,或经营民族企业,一直活跃在工商业的战线上。可以如是说,无论郑观应提出过何种先进的思想,首先他是一名商人,他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工商业的发展作为一个

至关重要的准绳。尤其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郑观应的思想尚未完全成熟,尚未把改良政治制度同发展实业有机联系在一起,尚未形成其早期维新思想的时期,^⑨这种以工商业的发展为准绳的思考问题的方式甚至可能演变成一种看待问题的局限性。因为思想成熟之后的郑观应,虽然其思想的核心在于发展实业,但同时也会兼顾其他,因为他明白政治和经济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但当他尚未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便可能会因为重视实业而忽略了政治,甚至把本与实业关系不大的问题也归之于实业方面的问题。如对普法战争的认识即是一例,工商业的发达,固然是普鲁士战胜法国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如郑观应所言,“非德兵果精于法兵”,恰恰相反,德军的精良相对于工商业的发达,可能是更加重要、更加直接的原因。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人生经历的不同,导致郑观应与王韬在 19 世纪 70 年代的思想成熟度与核心关注点不同,进而使得他们对普法战争的理解迥异,一个成为了近代中国译介普法战争的第一人,而另一个对普法战争的认识却从属于发展实业的主导思想之下。

二、全面师法德国——郑观应对德认知的升华

大凡中外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他们的思想皆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世事的变迁,随着他们人生阅历的不断丰富而逐渐形成的,这一点已然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郑观应也不例外,从《易言》与《盛世危言》的对比来看,郑氏的思想在 19 世纪 80 年代是有一次质变的。

从《易言》来看,19 世纪 60、70 年代的郑观应尚未形成成熟的维新思想体系。综观《易言》,其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相关的,虽然郑氏也朦胧地认识到了改良政治的必要性,但他仍旧是以中国古代的“三代之制”为蓝本。他在《论议政》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了“三代之制”的优良之处:“窃考三代之制:列国如有政事,则君卿大夫相议于殿廷,士民搢绅相议于学校。故孟子有左右诸大夫之言未可尽信,必察国人皆言,而后黜陟乃定。汉朝饬博士议复,尚存遗意”。在此之后才提到了泰西的议院,“泰西列国则不然,其都城设有上、下议院。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大员当之,以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以其近于民也。凡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详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主。若两院意见符合,则国主决其从违。倘彼此参差,则或令停止不议,或覆议而后定。故泰西政事举国咸知,所以通上下之

情,期措施之善也”。最后落到实处,认为当下的中国应当“上效三代之遗风,下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务使上下无轩格之虞,臣民泯异同之见,则长治久安之道,固有可豫期矣”。^⑩由此可见,此时的郑观应,对于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还只是停留在一个非常浅显的层次,他认为中国古代的政制才是最优良的制度,而泰西的政制仅仅是“颇与三代法度相符”。基于这样的认识,就注定了这个时期的郑观应还不能真正体会到西方政制的优良之处,更不可能认识到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只有政治稳固,他本人所从事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才有真正实现振兴之可能。这一点在其《论公法》一文中得到了印证,郑观应认为“各国之籍以互相维系,安于辑睦者,惟奉万国公法一书耳。其所谓公者,非一国所得而私;法者,各国胥受其范。然明许默许,性法例法,以理义为准绳,以战利为纲领,皆不越天理人情之外。故公法一出,各国皆不敢肆行,实于世道民生,大有裨益”。^⑪也就是说,郑观应认为只要有公法约束,各国就不敢肆意妄为,而实际上,他没有意识到,只有改良政制,只有中国富强了,才能在商业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否则,所谓的公法无非是一纸空文而已。

然而,恰如夏东元教授所指出的,1884 年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后,郑观应开始把民主制度与科学技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加以论述。^⑫在《南游日记》中,他开始摒弃以“三代之制”为准绳看待问题的老方法,开始以实事求是的眼光看待西方政制。“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证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轩格,难臻富强”。^⑬综观《盛世危言》,较之于《易言》,的确有十分明显的变化,它不再是通篇论述资本主义工商业,而是涉及政治、学校、日报及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这说明,此时的郑观应已经能够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是不可以单独存在的,而是与政治及社会文化等其他方面相辅相成的。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郑观应对德国的认识也发生了质的飞跃,他不再是以工商业出发去狭隘地看待德国,而是用整体的眼光看待这个欧洲后起之秀,他关注德国的方方面面,并以德为师,要求中国全面学习德国。郑观应对德国的认知,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普法战争认识的深化。笔者在上文的论述中,有一个大致的时间界定,即在普法战争爆发后的近十年间,郑观应对普法战争的认知是

较为狭隘的。但在 19 世纪 80 年代之后，郑氏对普法战争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郑氏打破了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之角度看待普法战争的狭隘视角，开始全面地分析看待普法战争。在一篇名为《自强论》的文章之后，郑观应附录了《胶报》上的一篇名为《普国中兴事略》的文章，虽然是附录，但郑观应既然将其收入《盛世危言》之中，足见郑氏对其中观点是充分认可的。这篇文章指出了普国战胜法国的两大决定性因素，即“人心”和“立宪”。自普国丧败之后，开始“破除旧制，令凡民皆有自主之权。是时世爵大族，咸大不便，群起阻抗，而普政府毅然行之，遴选议员入议院，举国之民，皆有议政之权，政府为之主持而已。于是民心大变，视国事如己事，勃然生忠君爱国之心。国有大事，皆竭其心力，输其财产以济公家之急。普国之强，实基于此”。除了改良制度之外，“自君至民，皆卧薪藏胆，以雪耻为国。普皇渐减侍从，节衣食，所食之物与民平等，有卫文公布衣帛冠之风。卖御厩之马过半，以充公用，凡宫内金银器物，皆熔以铸钱。皇后亦撤簪珥，以输国库。大臣百官皆自请减俸，民间踊跃输将，税增而民不怨。凡民皆务节俭进以其余财供国用。民间妇女亦典卖衣饰以输纳于国。上下一心，无贵无贱，皆输财佐国。不及一年，而法人所索之军饷已如数补偿”。^⑭应该说，该文的分析是比较深刻的，且不论其在文字表述上是否有夸大其词之处，但其确实指出了普国战胜法国的两大深刻原因，即上文所述的“人心”与“立宪”。正是由于政制的改良，使得普国资产阶级得以部分参与国家大事，进而使得普国政治打破了过去死寂沉沉的局面，焕发出勃勃生机；正是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感召下，使得普国民众一致要求战胜法国侵略者，统一四分五裂的德意志，从这个角度看，作者的分析实属不刊之论。除此之外，郑观应还认识到了教育对普法战争的促进作用。“普国败于拿破仑第一，举国为其臣妾。其贤相施泰因曰：‘欲雪此耻辱，非先教育国民发扬其爱国之心不可。’普王符里持力盛林曰：‘虽国之面积缩小，对外之国坠地，然吾等宜养内心之力，务发扬内心之光辉，今后尽力于国民之教育，是朕所深望。’其将军毛奇曰：‘普国制胜邻国之功，宜归之小学教育。’诚哉此言！普为法败后六十余年，不独国能自立，且能胜法，实由于教育之路。此史家之所宜普知也。”^⑮在《间谍》一文中，郑氏谈到了间谍在普法战争中的作用。“今德国相臣俾士麦、将军毛奇，如汉之留侯曲逆善于用间谍者也。毛奇知德、法之将有战局也，即留心法之地势：凡山川险要、程途远近，逐一绘出，故以兵

入法驾轻就熟，使法不及拒。”^⑯从这段论述中可知，郑氏的核心思想在于突出间谍在战争中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亦不难看出，郑氏对德国指挥官俾士麦、毛奇等人的作战、筹划能力也深有认知，其实，这也是普国战胜法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凭心而论，郑观应对于普法战争的认识，还很难与王韬相提并论，例如王韬在《普法战纪》中，对德国士兵的素质、对德法两国武器装备的对比，都有较为详尽的论述。^⑰而即便是数十年之后，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也达不到王韬当年的水平，他虽然多次赞扬德国的武器与军事制度，但对于军事因素在普法战争中的作用，却并没有加以分析。当然，郑氏与王氏之间的差距，也是与二人所处的环境有关，郑观应身在大陆，他所获得的，只有通过报刊得来的二手资料；反观王韬，其身在香港且外国友人甚多，这种条件是郑观应所不能比拟的。但无论如何，随着郑观应维新思想体系的成熟，他对普法战争的认知程度大大深化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二是对德国政治制度的认知。20 世纪 80、90 年代，郑观应的维新思想体系日臻成熟之际，德国的政治制度也纳入了他的视野。郑观应认为德国属于“君民共主”的国家，是最值得中国效法的榜样，他否定了“议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的说法，认为“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⑱而德国在郑观应眼中，正是这种君民共主的国家。“然博采旁参，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因其本民主也。法国议院不免叫嚣之风，其人习气使然。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则莫如英、德两国议院之制”。^⑲郑观应分析了德国的情况，认为正是由于德国用君民共主制取代了旧有的君主专制，才使得其举国同心，打败了压迫他们的法国，“普鲁士本专以君权治国者也，乃为君权最重之拿破仑制其死命。普相赐德英伯爵忧之，以计笼络通国之人，使抗拿破仑，嘉庆十二年即一千八百七年特设一会，名曰良民会，未几，通国绅士皆入其会。会中所订章程，其最善者为允许其民日后自立报馆，任意议论政事，国家议院亦由民间公举。因而良民会之权亦因之以重，至其权力之从何而起，则终不轻泄于外也。普国既立良民会，嘉庆十八年西历一千八百十三年日耳曼列邦同具是心，猝然而为一，以逐拿破仑”。^⑳在赞扬了德国的政体之后，郑观应进而提出了在中国开设议院的主张：“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㉑由此可见，在郑观应眼

中,德国所采取的是一种最为优越的君民共主制,正是由于这种制度取代了旧有的君主专制,才使得德国摆脱了法国的压迫。应该说,郑观应的这种看法是较为合理的,德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资产阶级与封建容克相互妥协的基础之上,保留了一些封建色彩,而在当时的中国,清王朝仍旧顽固坚持君主专制,站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来看,郑观应提出一种德国式的君民共主政体,并要求中国学习它,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三是对德国军事的关注。基于普法战争的影响,清朝统治者对德国的军备极为赞许,由此掀起了一场学习德国军事制度,购买德国武器的热潮。李鸿章多次购买德国装备以强化清廷的部队,仅1885年至1892年间,德国输入中国的军火中就有克虏伯大炮432门,舰用炮20门,鱼雷炮9门,鱼雷30枚,以及弹药等其他大批军备物资。从1880年至1899年,中国海军购入德国舰船36艘。^②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留心时事的进步思想家,郑观应对德国军事的关注自然是必不可少。郑氏盛赞德国的火器,他认为西洋的火器出色,而德国的火器则又冠绝西洋。“西人专用火攻,其器固以钢炮为良,更以德人克鹿卜炮为最。缘钢产莫佳于德国,而克鹿卜炮之制炼尤精,以故名噪诸邦,五大洲争相购置”。“弹子之名,虽有开花钢弹、开花生铁弹、生铁群子弹、洋铁管散子弹种种不同,更无有出于德国双层铜箍之右者”。^③可见,郑观应对德国的火器是大加赞赏的。除此之外,郑氏对德国的军事制度也予以了关注。“德士花之安云:彼国以医士巡行都邑,选精壮少年入营,操练三年有成,方许授室。以故举国皆兵,凡遇军务,仓卒应征,莫不有勇知方为国效力。其枪法、阵法、口号,平时本训练已熟,退归团练期内,每年仍调操十二次,以免生疏。大、小将官均由武备学堂挑选,精于布阵、骑击、测量、绘画,屡考上等者方授以职,武可兼文,文不能兼武。每岁国君大阅,计陆兵、水师野战各一次,操时与对敌无异。每营有司粮食者,有司制造者,有司修理机械、建造炮台者,有司造筑铁路、桥梁者,有司制备兵食、料理医药、疗治疾病者。其讲求之不遗余力如此”。^④在《水师》一文中,郑氏对德国的水军也有所涉猎,“德国水师俱用克虏伯炮械,虽操法与英国稍异,而专用是炮者定臻精密”。^⑤综上所述,在洋务派大力师法德国军事的年代,郑观应亦对德国的火器、军事制度等给予了较为充分的关注。

四是对德国工商业的认知。作为一位实业家,商业始终是郑观应关注的对象,在《盛世危言》中,德国的商业状况同样受到了郑观应的关注。

他介绍了德国的保险法,“德国则有专保百工之险者。保险之法:凡七日抽工银数厘,厂主各助数厘,国家贴官帑若干,积成巨款。如遇百工或老、或弱、或疾病、或受伤,即将保险之资拨赔养赡。在工人以平日之浪费略加撙节,幸而此身无恙,即可周济同人;不幸自罹灾厄,则一身既言残喘,妻孥亦免饥寒。利己利人莫善于此。而水火、盗贼诸险,可由此而推矣”。^⑥郑观应介绍了德国的商会制度,并要求清政府学习这种制度。“昔年德国商人虽贸易有方,亦迫于关税烦苛,更迫于匪人劫掠。谋什一者无所得利,反多折耗,因而通国商人聚议立约,歃血会盟:每埠必有商会,彼此声气相联,互相保护,名曰保护会,亦名商会。如有爵员及官兵、盗贼恃强以害商者,会中人必协力御侮,不受欺凌;或有劫掠等事,械知四处,严搜密访,务使救获;倘国家有害商虐政,亦准其具禀,申诉裁革。此会一兴,商务大振,于是荷兰、瑞典、瑙威等国首效之,而英、法、西等国朝廷知其法善,亦准商人在本国设立公会,自为保护,以免他虞。今朝廷欲振兴商务,各督、抚大臣果能上体宸衷,下体商情,莫若奏请朝廷增设商部,以熟识商务,曾环游地球,兼通中、西言语文字之大臣总司其事,并准各直省创设商务总局。……”^⑦对于德国的商学,郑观应也作了一番介绍,“德于数十年前师法英人,设商学以教贸易,并立博物院罗致各国货物,以藉资效法而广见闻,故商学堂中人才蔚起,而德之商务大兴”。^⑧进而,郑氏认为中国应该在商务局中兼设商学。总而言之,郑观应对德国的工商业有着一定程度的关注,并要求中国以德为师,学习德国的保险、商会等工商业政策。

五是对德国文教事业的认知。学校,是培养人才的重地,是国富民强之本,这是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郑观应亦不例外,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郑氏对德国的学制情有独钟,他在《学校》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德国的学制。认为今泰西各国犹有古风,其学校规制大略相同,而德国尤为明备。郑氏对德国学制的介绍,大略有如下内容:一是民众接受教育的广泛性。无论贵贱男女,自五岁后皆须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即下至聋、瞽、暗、哑残疾之人,也要学习一门技艺。二是学费的问题。德国的学费较为低廉,且贫困者可免出部分学费。三是课程内容。院中生徒分数班,班有专师,教授各种不同课程。四是升学制度。根据成绩的不同,升入不同的学院。^⑨在该文的附录中,有《德国学校规制》一文,对德国的学制介绍得更详尽。当然,郑观应详细介绍德国学制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求中国师法德国,

“今中国既设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各堂，历有年所，而诸学尚未深通，制造率仗西匠，未闻有别出心裁创一奇器者，技艺未专，而授受之道未得也。诚能将西国有用之书，条分缕晰，译出华文，颁行天下各书院，俾人人得而学之。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材之众，竭其聪明才智，何难驾西人而上之哉”^⑩应该说，郑观应对德国的文教事业之关注程度是比较高的，他对德国学制之优点的阐述也不无道理。

综上所述，在20世纪80、90年代，郑观应对德国的认知较为全面，在“以德为师”的观念指导下，他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德国的政治、军事、商业、文教等多方面内容，并呼吁中国学习德国的优点，从而达到国富民强的终极目标。应该说，郑观应的德国观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因为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清统治阶级还沉浸在洋务运动的潮流中，他们只看到了“器”的层面，故而大力学习、购买德国的军备，而对德国的其他层面，则显得关注不够。在这样的情况下，郑观应高瞻远瞩，介绍了德国方方面面的优点并要求中国向德国学习，这是当时的统治阶级以及一般的国人所没有达到的思想境界，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三、进步与落后并存——世纪之交郑观应的德国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真可谓风云突变，洋务运动、同治中兴未能挽救腐朽没落的清王朝，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德国强占胶州湾，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然而，值此危急存亡之秋，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们站起来了，在孙中山等先驱的奔走呼号下，代表着新世纪进步力量的革命派逐渐崛起并最终推翻了清王朝。那么，在这样一个风云突变的年代，作为晚清时期的维新知识分子，郑观应的德国观又是怎样的呢。

首先是郑观应对德占胶州的看法。自普法战争以来，由于德国实力所限，并未觊觎远东，故而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友好关系，但自德皇威廉二世执政以来，却一改之前温和的对华政策，急切地想要在中国抢占一个海军基地，在这种侵略政策的指导下，德国于1897年强行占据了胶州湾。从此以后，中国人对德国的印象急转直下，清政府虽然在对德外交中一味妥协，但其愤怒之情却是实实在在的，就连恭亲王也明确表示德国的行动是对中国的侮辱。^⑪在广大知识分子的眼里，对于德国的侵略行径更是怒不可遏，翻阅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国闻报》或《申报》，不难发现，知识分子对德国的声讨之音不绝于耳。作为一名关心时事的知识分子，郑观应对于德占胶州这样的大事，自然会予以关注。从相关史料来看，

郑氏对这一事件的认识是比较到位的。首先，郑观应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有着一颗强烈的爱国心。他对德国的行为感到愤慨，认为既是传教劝人为善，如被百姓谋害，例不过抚恤，何以不候究办，遽然占据胶州，且勒索多端，这是一种欺人太甚的行为。^⑫另外，更重要的是，郑观应不是一味地声讨指责，他有着较一般知识分子更加理性的思考，他准确地洞察到了在德占胶州之后，列强会援“利益均沾”的条款而争相效尤。“德既无理，而我复退让，列强又将援‘利益均沾’之例，群起而谋我”。他还看到，值此危机存亡之际，变法图强已经势不容缓，指出清政府应该变法自强，而不可因循贻坐误之机。^⑬应该说，在德占胶州后，郑观应目击时艰论时局，既有一颗热忱的爱国之心，又有冷静而深邃的思考，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但同时必须指出，郑氏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对于世界大势的认识终究存在着某些时代赋予他的局限性，就算是在德占胶州之后，他仍然幻想着靠所谓的公法来为中国争取权益，他提出要派专使把德国的无理之处布告各国，使天下人皆知公是公非，德国理屈，无能掩饰，必不敢如此欺人太甚；如不派公使，而各国君主亦无由断其曲直，倘皆置之不理，又何必派公使驻京都往来聘问乎？^⑭从这里可以看出，郑观应终究还是没能看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原因是他作为一名近代中国“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很难完全脱离封建因素的羁绊，他所说的道德、公理、是非曲直等等，都是按照中国的道德标准来衡量的，但在帝国主义盛行的时代，强权即公理，所谓的“中国式”道德是不存在的，而郑观应心中所恪守的“违理”或“不违理”对于帝国主义而言并没有任何约束作用。综上所述，对于德占胶州这一历史事件，郑观应的认知水平在当时算是比较高的，但其局限性也不可避免的得到了体现。

其次是对德国式立宪政体的热衷。当历史的车轮前进到20世纪时，君主立宪政体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因为极端腐朽的清政府根本无法像英国那样实行立宪政体，这一点已经被事实无数次的证明。正是在20世纪初，代表着民主共和的革命派与代表着君主立宪的保皇派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战，最终，象征着进步的革命派取得了胜利。在这样的背景下，郑观应依旧坚持着他所热衷的德国式君主立宪，并要求将之用于中国。“查泰西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尽量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⑮“德意志前皇威廉以艰苦卓绝之行，建联邦集合之举，又得

贤臣俾斯麦以为佐之，用能一战胜法，强莫与争。此君主立宪效果之明验者也”。^⑧而对于民主共和，郑观应持否定态度，认为“惟未经君主立宪之阶段，而遽希望民主，识着有嫌其太骤耳”。^⑨他还认为俾士麦宁牺牲人民而偏重国家是一种正确的举措。^⑩如果说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对德国政治体制的赞美是具有进步性的，那么同样是对德国政治体制的赞美，到了20世纪初年，便不再具有进步性了。因为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洋务派与顽固派的竞争如火如荼地进行，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人敢提出变革中国的政治体制，而郑观应高瞻远瞩，看到了德国立宪政体的优势并要求中国实行它，这是进步的。但在20世纪初年，清王朝的腐朽没落已经彰显无疑，这样的王朝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君主立宪，这是被事实所证明的，然而郑观应仍旧把德国政体看作是最适合中国效仿的，并千方百计排斥民主革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落后的认知。当然，我们不能全然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苛求古人，作为一个出生于晚清的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他不可能完全摆脱清王朝这个伴随了他一生的朝廷，这是极其正常的现象。其实，不唯郑观应如此，就连毅然擎起维新变法大旗的时代俊杰康有为、梁启超也同样如此。

再次是对德国文教、实业的认知。虽说郑观应对德国政治体制的认知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但他对德国文教、实业的认知依旧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早在上个世纪，郑观应就盛赞德国的教育之善，如今，郑氏依旧不改初衷，他认为世界各国学校之最善者莫如德、日。^⑪他把学校教育看成是商战的基础，只有学校教育办好了，才有商战的资本，才能进而使国家富强，而德国正是成功的例子。“德国不过合二十五小邦而成国，以能广设学校之故速致富强。俾士麦曰‘德国富强，其人才皆出于学校’”。^⑫郑观应认识到了德国在教育领域的先进性，并要求中国学习德国，通过教育来培养商业人才，进而达到强国的目的，这样的看法是颇有可取之处的。另外，郑观应看到了德国在发展实业方面独立自主的精神，认为德国对于外国产品，无不认真研究，自行制造，故而总能青出于蓝，价廉工巧；而中国总是聘用外国人，结果金钱外溢，权亦外操。因此，中国当学习德国，无庸借才外域，而要独立自主，才能达到富强。^⑬不愧是一位老道的实业家，郑观应对德国的优点分析得十分准确，其要求中国效法德国的建议也颇为正确。

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国近代早期维新知识分子郑观

应之德国观的梳理，得出了如下结论：

第一，不可用“进步”或“落后”来对郑观应的德国观盖棺定论。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而非静止不动的过程，人物的思想也是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的。因此，我们评价某个人物的某种思想，切不可一概而论，而应该将其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去加以具体地考察。在20世纪70年代，郑观应还只是一名初出茅庐的买办，此时的他尚未形成系统的维新思想体系，而是仅仅从商业的角度思考问题，因此他对普法战争的认识，在一段时间中是十分浅显的。在20世纪80、90年代，当统治阶级沉浸在对德国军事的膜拜之下，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之时，作为一名成熟的维新知识分子，郑观应超出了统治阶级以及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认知水平，全面介绍了德国的方方面面并要求中国向德国学习。可以说，这个阶段郑观应对德国的认知水平很高，具有很强的进步性。而当历史的车轮前进到20世纪初那个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郑观应对德国政制的由衷赞美便成为了一种不合时宜的、落后的认知，当然，他对德国文教及实业的认知依旧是那么深邃而具有启发性。

第二，郑观应对德国的认知达到了19世纪80、90年代中国人对德认知的较高水平。虽说对郑观应的德国观不可一概而论，但值得强调的是，在19世纪80、90年代这个时间段，他的德国观无疑代表了中国人对德认知的较高水平。在这个时期，张德彝的大作《五述奇》自然是当时介绍德国最为全面的著作，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身在国内，以经营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主业的郑观应能够如此全面地洞察到德国方方面面的优点并要求中国向德国学习，实属难能可贵。这一点，不惟李鸿章等封疆大吏做不到，就连有幸亲临德国的外交使臣们，诸如刘锡鸿、李凤苞等人也没有做到。故而，郑观应在19世纪80、90年代的对德认知达到了较高水平，这一点应当是不为过的。

中国人的德国观，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课题，它以思想史的角度切入来研究外交史方面的问题。作为当今世界上的两个强国，中国同德国之间的关系不容忽视，研究中国人对德国的看法，有助于我们理清历史，认识当下。然而，对于这个课题的研究还仅仅是开始，这篇小文权且当作抛砖引玉，若能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到这个领域，有心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笔者便甚感欣慰了。

[注 释]

① 胡凯：《中德风云际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 ② 胡凯:《中德风云际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 11 页。
- ③ 郑宗玉:《论郑观应的德国观》,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 年,第 1 期。
- ④ 忻平:《王韬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06 页。
- ⑤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79 页。
- ⑥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82 页。
- ⑦ 张承宗:《王韬的〈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参阅吴泽主编:《中国史学集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 ⑧ 忻平:《王韬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02 页。
- ⑨ 夏东元教授认为 1884 年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郑观应尚未将民主制度与科学技术有机联系在一起(参阅夏东元:《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 1985 年版,前言第 11 页)。基于对《易言》与《盛世危言》的比较阅读,笔者认同夏东元教授的观点,认为在 80 年代之前,郑观应的维新思想体系未臻成熟。
- ⑩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103 页。
- ⑪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66 页。
- ⑫ 夏东元:《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1985 年版,前言第 11 页。
- ⑬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967 页。
- ⑭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41 页。
- ⑮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264 页。
- ⑯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919 页。
- ⑰ 胡凯:《中德风云际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 64 页。
- ⑱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16 页。
- ⑲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12 页。
- ⑳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17 页。
- ㉑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13 页。
- ㉒ 杜继东:《中德关系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8 页。
- ㉓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217~218 页。
- ㉔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853~854 页。
- ㉕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877 页。
- ㉖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528 页。
- ㉗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605~606 页。
- ㉘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615 页。
- ㉙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246 页。
- ㉚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248 页。
- ㉛ 廉立之、王守中:《山东教案史料》,济南齐鲁书社,1980 年版,第 210 页。
- ㉜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59 页。
- ㉝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58 页。
- ㉞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59 页。
- ㉟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02 页。
- ㊱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23 页。
- ㊲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24 页。
- ㊳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408 页。
- ㊴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241 页。
- ㊵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634 页。
- ㊶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30 页。

[参考文献]

- [1] 胡凯. 中德风云际会[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11.
- [2] 郑宗玉. 论郑观应的德国观[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1996(1):91~96.
- [3] 忻平. 王韬评传[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106.
- [4] 夏东元. 郑观应集(上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79.
- [5] 张承宗. 王韬的〈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A]//. 吴泽. 中国史学集刊[C].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233.
- [6] 夏东元. 郑观应传[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85:11.
- [7] 杜继东. 中德关系史话[M]. 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8.
- [8] 廉立之,王守中. 山东教案史料[M]. 济南:齐鲁书社, 1980:210.
- [9] 夏东元. 郑观应集(下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359.

(责任编辑:晴空)